



(2023 年 12 月，第十二期)

编委会

主 编：屠磊

副主编：丁峰、王竞、刘蓉蓉

责任编辑：刘蓉蓉、朱旻卿

目录

一、 新法速递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3
二、 观点速递	24
上海金融法院、上海证监局联合发布十件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	
——上海金融法院、上海证监局	24
三、 实务研究	41
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类案裁判方法	
——摘自微信《上海一中法院》	41

一、新法速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发文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3.12.04

生效时间：2023.12.05

效力状态：现行有效

文号：法释〔2023〕13号

（2023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9次会议通过，自2023年12月5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以及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解释合同条款时，应当以词句的通常含义为基础，结合相关条款、合同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参考缔约背景、磋商过程、履行行为等因素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

有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对合同条款有不同于词句的通常含义的其他共同理解，一方主张按照词句的通常含义理解合同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可能影响该条款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选择有利于该条款有效的解释；属于无偿合同的，应当选择对债务人负担较轻的解释。

第二条 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所称的“交易习惯”：

（一）当事人之间在交易活动中的惯常做法；

（二）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

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二、合同的订立

第三条 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根据前款规定能够认定合同已经成立的，对合同欠缺的内容，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等规定予以确定。

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请求撤销、解除合同等，人民法院认为合同不成立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将合同是否成立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第四条 采取招标方式订立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自中标通知书到达中标人时成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成立后，当事人拒绝签订书面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等确定合同内容。

采取现场拍卖、网络拍卖等公开竞价方式订立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自拍卖师落槌、电子交易系统确认成交时成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成立后，当事人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拍卖公告、竞买人的报价等确定合同内容。

产权交易所等机构主持拍卖、挂牌交易，其公布的拍卖公告、交易规则等文件公开确定了合同成立需要具备的条件，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自该条件具备时成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第三人实施欺诈、胁迫行为，使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到损失的当事人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亦有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确定相应的责任。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对当事人与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条 当事人以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形式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或者为担保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交付了定金，能够确定将来所要订立合同的主体、标的等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预约合同成立。

当事人通过签订意向书或者备忘录等方式，仅表达交易的意向，未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或者虽然有约定但是难以确定将来所要订立合同的主体、标的等内容，一方主张预约合同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订立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已就合同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主要内容达成合意，符合本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合同成立条件，未明确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另行订立合同，或者虽然有约定但是当事人一方已实施履行行为且对方接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本约合同成立。

第七条 预约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一方拒绝订立本约合同或者在磋商订立本约合同时违背诚信原则导致未能订立本约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当事人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义务。

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一方在磋商订立本约合同时是否违背诚信原则，应当综合考虑该当事人在磋商时提出的条件是否明显背离预约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是否已尽合理努力进行协商等因素。

第八条 预约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对

方请求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预约合同在内容上的完备程度以及订立本约合同的条件的成就程度等因素酌定。

第九条 合同条款符合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仅以合同系依据合同示范文本制作或者双方已经明确约定合同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是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从事经营活动的当事人一方仅以未实际重复使用为由主张其预先拟定且未与对方协商的合同条款不是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有证据证明该条款不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除外。

第十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通常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按照对方的要求，就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对方作出通常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说明义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其已经尽到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仅以采取了设置勾选、弹窗等方式为由主张其已经履行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其举证符合前两款规定的除外。

三、合同的效力

第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是自然人，根据该当事人的年龄、智力、知识、经验并结合交易的复杂程度，能够认定其对合同的性质、合同订立的法律后果或者交易中存在的特定风险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力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情形构成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缺乏判断能力”。

第十二条 合同依法成立后，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不履行报批义务或者履行报批义务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或

者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方请求其继续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方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其承担违反报批义务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判决当事人一方履行报批义务后，其仍不履行，对方主张解除合同并参照违反合同的违约责任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合同获得批准前，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对方履行合同约定主要义务，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是不影响其另行提起诉讼。

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已经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或者已经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报批义务，批准机关决定不予批准，对方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因迟延履行报批义务等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未获批准，对方请求赔偿因此受到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当事人以该合同已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已经批准

机关批准或者已依据该合同办理财产权利的变更登记、移转登记等为由主张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四条 当事人之间就同一交易订立多份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中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效。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依据前款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无效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被隐藏合同为事实基础，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就同一交易订立的多份合同均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各合同成立先后顺序和实际履行情况的基础上，认定合同内容是否发生变更。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变更合

同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的相应变更无效。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当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称，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当事人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根据合同内容认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缔约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结构、履行行为以及当事人是否存在虚构交易标的等事实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民事法律关系。

第十六条 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能够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关于“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规定认定该合同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

(一)强制性规定虽然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响显著轻微，认定合同无效将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有失公平公正；

(二)强制性规定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者其

他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该规范目的的实现；

(三)强制性规定旨在要求当事人一方加强风险控制、内部管理等，对方无能力或者无义务审查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将使其承担不利后果；

(四)当事人一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违反强制性规定，但是在合同订立后其已经具备补正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条件却违背诚信原则不予补正；

(五)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当事人以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合同履行必然导致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据前两款认定合同有效，但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

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 合同虽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

(一)合同影响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国家安全的；

(二)合同影响社会稳定、公平竞争秩序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违背社会公共秩序的；

(三)合同背离社会公德、家庭伦理或者有损人格尊严等违背善良风俗的。

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交易目的、政府部门的监管强度、一定期限内当事人从事类似交易的频次、行为的社会后果等因素，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当事人确因生活需要进行交易，未给社会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且不影响国家安全，也不违背善良风俗的，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第十八条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虽然有“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但是该规定旨在限制或者赋予民事权利，行为人违反该规定将构成无权处分、无权代理、越权代表等，或者导致合同相对人、第三人因此获得撤销权、解除权等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关于违反该规定的民事法律后果认定合同效力。

第十九条 以转让或者设定财产权利为目的订立的合同，当事人或者真正权利人仅以让与人在订立合同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未取得真正权利人事后同意或者让与人事后未取得处分权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受让人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让与人承担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前款规定的合同被认定有效，且让与人已经将财产交付或者移转登记至受让人，真正权利人请求认定财产权利未发生变动或者请求返还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受让人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等规定善意取得财产权利的除外。

第二十条 法律、行政法规为限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的代表权，规定合同所涉事项应当由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权力机构或者决策机构决议，或者应当由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执行机构决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未取得授权而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法人、非法人组织有过错的，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相对人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的规定处理。

合同所涉事项未超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代表权限，但是超越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章程或者权力机构等对代表权的限制，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法人、非法人组织举证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限制的除外。

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后，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追

偿因越权代表行为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法律、司法解释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民事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就超越其职权范围的事项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法律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法人、非法人组织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前述情形，构成表见代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合同所涉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时超越其职权范围：

（一）依法应当由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权力机构或者决策机构决议的事项；

（二）依法应当由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执行机构决定的事项；

（三）依法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代表法人、非法人组织实施的事项；

（四）不属于通常情形下依其职权可以处理的事项。

合同所涉事项未超越依据前款确定的职权范围，但是超越法人、非法人组织对工作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法律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法人、非法人组织举证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限制的除外。

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后，向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二条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且未超越权限，法人、非法人组织仅以合同加盖的印章不是备案印章或者系伪造的印章为由主张该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系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但是仅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签名或者按指印而未加盖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印章，相对人能够证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时未超越权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对法人、非法人

组织发生效力。但是，当事人约定以加盖印章作为合同成立条件的除外。

合同仅加盖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印章而无人员签名或者按指印，相对人能够证明合同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其权限范围内订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在前三款规定的情形下，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时虽然超越代表或者代理权限，但是依据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的规定构成表见代表，或者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第二十三条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法人、非法人组织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人、非法人组织请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对因此受到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举证，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合同在订立时是否显失公平、相关人员是否获取了不正当利益、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因素，人民法院能够认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存在恶意串通的高度可能性的，可以要求前述人员就合同订立、履行的过程等相关事实作出陈述或者提供相应的证据。其无正当理由拒绝作出陈述，或者所作陈述不具合理性又不能提供相应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成立。

第二十四条 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经审查财产能够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单独或者合并适用返还占有的标的物、更正登记簿册记载等方式；经审查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认定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之日该财产的市场价值或者以其他合理方式计算的价值为基准判决折价补偿。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还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补偿的情况，综合考虑财产增值收益和贬值损失、交易

成本的支出等事实，按照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根据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合理确定损失赔偿额。

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法且未经处理，可能导致一方或者双方通过违法行为获得不当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有权请求返还价款或者报酬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对方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但是，占用资金的当事人对于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没有过错的，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

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当事人主张同时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占有

标的物的一方对标的物存在使用或者依法可以使用的情形，对方请求将其应支付的资金占用费与应收取的标的物使用费相互抵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合同的履行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未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履行开具发票、提供证明文件等非主要债务，对方请求继续履行该债务并赔偿因怠于履行该债务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履行该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不存在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协议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生效。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履行以物抵债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相应的原债务同时消灭；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未按照约定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债权人选择请求履行原债务或者以物抵债协议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以物抵债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或者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制作成调解书，债权人主张财产权利自确认书、调解书生效时发生变动或者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财产权利订立以物抵债协议的，依据本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认定该协议的效力。

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抵债财产拍卖、变卖、折价以实现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抵债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但是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债权人请求对抵债财产拍卖、变卖、折价以实现债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订立前款规定的以物抵债协议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未将财产权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权人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已将财产权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第三人请求债务人向自己履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请求行使撤销权、解除权等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合同依法被撤销或者被解除，债务人请求债权人返还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债务人按照约定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第三人拒绝受领，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向自己履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债务人已经采取提存等方式消灭债务的除外。第三人拒绝受领或者受领迟延，债务人请求债权人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三十条 下列民事主体，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履行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

（一）保证人或者提供物的担保的第三人；

（二）担保财产的受让人、用益物权人、合法占有人；

（三）担保财产上的后顺位担保权人；

（四）对债务人的财产享有合法权益且该权益将因财产被强制执行而丧失的第三人；

（五）债务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

（六）债务人为自然人的，其近亲属；

（七）其他对履行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

第三人在其已经代为履行的范围内取得对债务人的债权，但是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担保人代为履行债务取得债权后，向其他担保人主张担保权利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等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一方以对方没有履行非主要债务为由拒绝履行自己的主要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对方不履行非主要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对方履行债务，被告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主张双方同时履行的抗辩且抗辩成立，被告未提起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在原告履行债务的同时履行自己的债务，并在判项中明确原告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原告履行自己的债务后对被告采取执行行为；被告提起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双方同时履行自己的债务，并在判项中明确任何一方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该当事人履行自己的债务后对对方采取执行行为。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对方履行债务，被告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主张原告应先履行的抗辩且抗辩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不影响原告履行债务后另行提起诉讼。

第三十二条 合同成立后，因政策调整或者市场供求关系异常变动等原因导致价格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涨跌，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变化”。但是，合同涉及市场属性活跃、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的除外。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变化，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得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请求变更合同，对方请求解除合同的，或者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对方请求变更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判决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应当综合考虑合同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当事人重新协商的情况以及因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等因素，在判项中明确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的时间。

当事人事先约定排除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适用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五、合同的保全

第三十三条 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向相对人主张其享有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

第三十四条 下列权利，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

（一）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请求权；

（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劳动报酬请求权，但是超过债务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的部分除外；

（四）请求支付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保障当事人基本生活的权利；

（五）其他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

第三十五条 债权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对债务人的相对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依法应当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债务人或者相对人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订有管辖协议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或者相对人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订有仲裁协议为由对法院主管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或者相对人在首次开庭前就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中止代位权诉讼。

第三十七条 债权人以债务人的相对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

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债务人的同一相对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债务人对相对人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清偿其对两个以上债权人负担的债务的，人民法院应

当按照债权人享有的债权比例确定相对人的履行份额，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八条 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的相对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合并审理。不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在起诉债务人的诉讼终结前，代位权诉讼应当中止。

第三十九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对超过债权人代位请求数额的债权部分起诉相对人，属于同一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合并审理。不属于同一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在代位权诉讼终结前，债务人对相对人的诉讼应当中止。

第四十条 代位权诉讼中，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债权人的主张不符合代位权行使条件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但是不影响债权人根据新的事实再次起诉。

债务人的相对人仅以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

为由，主张债权人提起的诉讼不符合代位权行使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十一条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减免相对人的债务或者延长相对人的履行期限，相对人以此向债权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十二条 对于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或者高价，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时交易地的市场交易价或者物价部门指导价予以认定。

转让价格未达到交易时交易地的市场交易价或者指导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价格高于交易时交易地的市场交易价或者指导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债务人与相对人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的，不受前款规定的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三十的限制。

第四十三条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实施互易财产、以物抵债、出租或者承租财产、知识产权许可使用等行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

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债权人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予以支持。

第四十四条 债权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的，应当以债务人和债务人的相对人为共同被告，由债务人或者相对人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依法应当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两个以上债权人就债务人的同一行为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第四十五条 在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中，被撤销行为的标的可分，当事人主张在受影响的债权范围内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撤销行为的标的不可分，债权人主张将债务人的行为全部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合理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费用，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四十条规定的“必要费用”。

第四十六条 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请求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务

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履行到期债务等法律后果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债权人请求受理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一并审理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合并审理。不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债权人依据其与债务人的诉讼、撤销权诉讼产生的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债务人对相对人享有的权利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申请对相对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六、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四十七条 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其对让与人的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让与人为第三人。

债务转移后，新债务人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原债务人为第三人。

当事人一方将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后，对方就合同权利义务向受让人主张抗辩或者受让人就合同权利义

务向对方主张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让与人为第三人。

第四十八条 债务人在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前已经向让与人履行，受让人请求债务人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仍然向让与人履行，受让人请求债务人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让与人未通知债务人，受让人直接起诉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债权转让事实的，应当认定债权转让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时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债务人主张因未通知而给其增加的费用或者造成的损失从认定的债权数额中扣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十九条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让与人以债权转让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为由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债权转让通知被依法撤销的除外。

受让人基于债务人对债权真实存在的确认受让债权后，债务人又以该债权不存在为由拒绝向受让人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债权不存在的除外。

第五十条 让与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两个以上受让人，债务人以已经向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履行为由主张其不再履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债务人明知接受履行的受让人不是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债务人继续履行债务或者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请求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接受履行的受让人返还其接受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明知该债权在其受让前已经转让给其他受让人的除外。

前款所称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是指最先到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受让人。当事人之间对通知到达时间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通知的方式等因素综合判断，而不能仅根据债务人认可的通知时间或者通知记载的时间予以认定。当事人采用邮寄、通讯电子系统等方式发出通知的，人民法院应当以邮戳时间或者通讯电子系统记载的时间等作为认定通知到达时间的依据。

第五十一条 第三人加入债务并与债务人约定了追偿权，其履行债务后主张向债务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没有约定追偿权，第三人依照

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等的规定，在其已经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范围内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加入债务会损害债务人利益的除外。

债务人就其对债权人享有的抗辩向加入债务的第三人主张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七、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时未对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作出处理，一方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当事人一方另有意思表示外，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合同解除：

（一）当事人一方主张行使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经审理认为不符合解除权行使条件但是对方同意解除；

（二）双方当事人均不符合解除权行使的条件但是均主张解除合同。

前两款情形下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

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五百六十七条和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并以对方未在约定的异议期限或者其他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其是否享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进行审查。经审查，享有解除权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不享有解除权的，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解除合同，撤诉后再次起诉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经审理支持该主张的，合同自再次起诉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但是，当事人一方撤诉后又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且该通知已经到达对方的除外。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一方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主张抵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抵销权成立的，应当认定通知到达对方时双方互负的主债务、利息、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等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

第五十六条 行使抵销权的一方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但是享有

的债权不足以抵销全部债务，当事人因抵销的顺序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条的规定处理。

行使抵销权的一方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抵销其负担的包括主债务、利息、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在内的全部债务，当事人因抵销的顺序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七条 因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或者故意、重大过失侵害他人财产权益产生的损害赔偿债务，侵权人主张抵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一方以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债权通知对方主张抵销，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应予支持。一方的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对方主张抵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八、违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以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其他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更加符合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的，人民法院可以以该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但是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

第六十条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时，可以在扣除非违约方为订立、履行合同支出的费用等合理成本后，按照非违约方能够获得的利润、经营利润或者转售利润等计算。

非违约方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并实施了替代交易，主张按照替代交易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替代交易价格明显偏离替代交易发生时当地的市场价格，违约方主张按照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非违约方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但未实施替代交易，主张按照违约行为发生后合理期间内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十一条 在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定期合同中，一方不履行支付价款、租金等金钱债务，对方请求解除合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应当依法解除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参考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市场价格变化、剩余履行期限等因素确定非违约方寻找替代交易的合理期限，并按照该期限对应的价款、租金等扣除非违约方应当支付的相应履约成本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非违约方主张按照合同解除后剩余履行期限相应的价款、租金等扣除履约成本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剩余履行期限少于寻找替代交易的合理期限的除外。

第六十二条 非违约方在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难以根据本解释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予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其他违约情节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确定。

第六十三条 在认定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根

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综合考虑合同主体、合同内容、交易类型、交易习惯、磋商过程等因素，按照与违约方处于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民事主体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予以确定。

除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外，非违约方主张还有其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应当支出的额外费用等其他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并请求违约方赔偿，经审理认为该损失系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确定违约损失赔偿额时，违约方主张扣除非违约方未采取适当措施导致的扩大损失、非违约方也有过错造成的相应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额外利益或者减少的必要支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合理的，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

当事人仅以合同约定不得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为由主张不予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并作出裁判。

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恶意违约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请求对方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确定不发生效力、不构成违约或者非违约方不存在损失等为由抗辩，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若不支持该抗辩，当事人是否请求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第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抗辩成立且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违约金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在当事人就是否应当调

整违约金充分举证、质证、辩论后，依法判决适当减少违约金。

被告因客观原因在一审程序中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是在二审程序中到庭参加诉讼并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就是否应当调整违约金充分举证、质证、辩论后，依法判决适当减少违约金。

第六十七条 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是没有约定定金性质，一方主张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约定了定金性质，但是未约定定金类型或者约定不明，一方主张为违约定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合同的担保，一方拒绝订立合同或者在磋商订立合同时违背诚信原则导致未能订立合同，对方主张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合同成立或者生效条件，应当交付定金的一方未交付定金，但是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并为对方所接受的，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在对方接受履行时已经成立或者生效。

当事人约定定金性质为解约定金，交付定金的一方主张以丧失定金为代价解除合同的，或者收受定金的一方主张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十八条 双方当事人均具有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违约行为，其中一方请求适用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一方仅有轻微违约，对方具有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违约行为，轻微违约方主张适用定金罚则，对方以轻微违约方也构成违约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

当事人一方已经部分履行合同，对方接受并主张按照未履行部分所占比例适用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方主张按照合同整体适用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部分未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非违约方主张适用定金罚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九、附则

第六十九条 本解释自 2023 年 12 月 5 日起施行。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二、观点速递

上海金融法院、上海证监局联合发布十件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上海金融法院、上海证监局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风险，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今年 9 月 1 日，《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为学习、宣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并发挥其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在 12·4 国家宪法日之际，上海金融法院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选编 10 件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向

社会各界发布，旨在进一步引导私募基金行业合法合规经营，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更好落实《条例》相关规定精神，统筹发展与安全，将规范监管和尊重市场规律相结合，促进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金融法院发布了近年来审理的五件典型私募基金案例。相关典型案例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清晰界定私募基金参与主体的权责。私募基金纠纷涉及投资者、管理人、托管人、销售机构、投资标的公司等多方主体，各主体法律关系和权责分配较为复杂。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控人向投资者推销私募基金的行为，坚持实质审查原则，有证据证明构成实质代销关系的，认定实控人负有告知说明义务和适当性义务。对于金融机构在销售阶段未履行信息说明和风险揭示义务的，判令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促进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义务。

二是充分保护私募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考虑到私募基金市场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对复杂金融产品缺乏判断能力等现实状况，畅通司法救济路径，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对于存在嵌套关系的私

募基金产品，在投资者对其管理人索赔无法实现救济的情形下，支持投资者直接起诉次级投资项目的管理人。在投资损失认定一般以清算为原则的前提下，明确当私募基金因管理人原因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况下，认定投资者损失已经发生并据此判决管理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保留追偿后二次结算的补偿路径。

三是坚决维护私募基金市场安全稳定有序运行。在涉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人退伙纠纷中，兼顾退伙合伙人权益与其他基金投资利益主体的价值权衡，引导资本市场运营主体规范经营。在处置基金财产执行案件中，尽可能保持基金持有财产的原有组成结构，按照比例处置基金财产，减少对基金后续正常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护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

上海证监局发布了近年来稽查或行政处罚的五件典型行政违法案例。相关典型案例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双管齐下严格追究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责任人员违法责任。本次发布的相关案例涉及 15 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及 12 名相关责任人员，其中包含

某荣系、某安系涉“系”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责任人员。自 2014 年《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私募办法》）实施以来，上海证监局共对 23 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立案调查，特别是对 5 起涉“系”机构的严重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有效促进了行业生态净化并持续向好。

二是坚决纠正募集、投资、管理等核心业务环节违规行为。相关案例涉及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投资活动、挪用基金资产等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社会影响大，也涉及适当性管理、信息披露、材料保存、信息报送等业务环节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三是积极发挥行政手段在规范市场秩序中的作用，同时加强司法协作。相关案例为投资者得到救济提供助力；个案探索犯罪线索和行政违法线索“双向移送”，加强案件查办中行政调查与刑事司法部门统一部署与紧密协作；推进涉众、涉系案件的行政处罚工作，进一步妥善化解私募基金风险。

下一步，上海金融法院将积极践行金融协同治理理念，强化司法裁判与监管目标的有机衔接，发挥司法审判规范引导作用，明确私募基金各参

与主体合理预期，保障私募基金市场安全稳定有序运行。上海证监局将按照《条例》授权履行职责，贯彻对私募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的要求，依法打击私募违法行为，有效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行为，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上海金融法院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

1. 周某某诉某资产管理公司、某投资集团等私募基金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6月，某资产管理公司成立“2018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并任管理人，由某证券公司任托管人。《私募基金合同》载明，该基金“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风险收益特征”，并约定基金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再通过该合伙企业对某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当月，周某某签署《风险揭示书》后，与某资产管理公司、某证券公司签订《私募基金合同》，并支付基金认购款 300 万元。某资产管理公司的实控人某投资集团向周某某出具《资金到账确认函》，载明周某某是通过某投资集团推介，自愿认购该

基金，并承诺某投资集团会配合相关单位做好该产品后续服务工作。

2019年10月28日，某资产管理公司发布《临时信息披露公告》称：该资管计划投资的某有限合伙企业因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恶意挪用基金资产并已失联，某资产管理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次日，案涉私募基金召开投资人电话会议，某投资集团经理在会议中介绍了其工作人员参与案涉基金管理的有关情况，并承诺全力推进后续刑事追偿进程。

周某某追索投资无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投资款、认购费及资金占用损失；某投资集团就某资产管理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作出（2020）沪 0115 民初 2780 号民事判决：一、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周某某基金投资款损失 3,000,000 元、认购费损失 30,000 元；二、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周某某截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的资金占用损失 450,924.66 元以及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

三、某投资集团对上述第一、二项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周某某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某资产管理公司、某投资集团不服提起上诉。上海金融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作出（2021）沪 74 民终 375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裁判意义

1. 完善基金管理人及其他主体参与基金募集管理活动的责任体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控人向投资者推销私募基金，并有证据证明构成实质代销关系的，实控人负有告知说明义务和适当性义务。管理人在投资管理过程中未体现专业独立性，而由实控人实际管理运作基金，因未尽忠诚勤勉义务造成投资者损失的，管理人及其实控人因违反监管规则和信义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基金投资损失的认定应以清算为原则，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认定损失已经固定。基金未投向约定标的，管理人亦未控制任何基金资产且资产追回期限不可预见，造成清算无法进行的，可以认定投资者损失已经固定。投资者诉请解除私募基金合同并返还投

资成本，解除合同条件虽不成立，但管理人等主体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可在投资者诉请的范围内判决责任主体赔偿实际损失。

2. 潘某诉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基金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7 年 2 月 22 日，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某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自 2017 年起持有“17 某信 Y1”、“17 沪某信 MTN002”两只债，2018 年第二季度资产管理报告中显示当期期末两只债的市值占资产净值比例分别为 9.10%、10.58%。其中，“17 某信 Y1”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停牌，且评级自 2018 年 3 月 2 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期间连续从 AAA 下调至 BBB+；“17 沪某信 MTN002”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被联合评级公司发布公告提示信用风险，其评级于 3 月 24 日至 5 月 4 日期间连续从 AA+下调至 BBB+，两只债券的市场价值波动较大。2018 年 5 月 15 日，联合评级公司公告决定将某信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BBB+下调至 B，将“17 某信 Y1”“17 沪某信

MTN002”等债券信用等级由 BBB+下调至 B。

2018 年 5 月 21 日，在案涉产品开放期，潘某签署《资管合同》购买 100 万份，“投资限制”条款约定：“投资于信用债债项评级不低于 AA”。2018 年 9 月 25 日、12 月 12 日，某信公司分别公告“17 沪某信 MTN002”“17 某信 Y1”债券无法按期支付利息，构成实质性违约。

2019 年 2 月 19 日，潘某赎回所有份额 875,011.25 份，金额 879,403.95 元。后潘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本金损失 120,596.05 元及利息损失。管理人在潘某购买产品时，未向其披露持仓两只某信债券评级不符合合同约定，且最终潘某损失即由该两只债券引起。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作出（2020）沪 0115 民初 4471 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资产管理公司应赔偿原告潘某本金损失 120,596.05 元；二、被告某资产管理公司应赔偿原告潘某相应利息损失；三、驳回原告潘某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提起上诉。上海金融法院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作出

（2021）沪 74 民终 1062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裁判意义

1. 私募产品自身特征影响风险揭示义务履行。案涉私募产品属于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的非净值型、私募产品类型，流动性相对较差，不能随时赎回止损。开放期新进投资者，以往存续期间的信息披露并不对其开放，此时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与募集阶段的信息披露类似，重在风险揭示。本案产品开放期前持仓两只债券市值占资产净值比例约为 20%，且一个多月短时间内信用评级及市值均跌幅较大，面临停牌或无买盘市场情况。在估值方法不能充分揭示风险又存在封闭期情况下，债券评级快速连续下降信息与风险直接相关，卖方机构应将该信息所包含的投资风险向投资者进行特别告知说明。

2. 风险揭示义务的法理基础在于保障投资者意思表示真实。信息不对称引起投资者决策时难以真正了解产品风险，可能做出不真实意思表示，影响缔约合同效力。金融产品销售中违反缔约时告知说明义务和适当性义务，是缔约过失典型表现。信息披露目的是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既包括卖

方机构向投资者概括性描述单一产品或多类产品总体风险类型，在实践中通常体现为风险揭示书内容；也包括对于具体条款风险告知说明。

3. 孔某申请执行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仲裁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孔某投资 200 万元认购 200 万份“某 1 号基金”基金份额。该基金由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某证券公司担任基金托管人，投资范围为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等。自 2019 年 5 月起，孔某多次要求管理人赎回其基金份额，但管理人一直未履行开放基金、赎回份额的义务，因此孔某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履行开放基金、赎回份额义务。上海仲裁委员会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作出（2020）沪仲案字第 3560 号裁决书，裁决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开放“某 1 号基金”，履行对孔某持有的 200 万份基金份额赎回义务。前述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上海某投资有

限公司未按照生效裁决履行义务，孔某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执行结果

2022 年 7 月 22 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2022）沪 74 执 195 号执行裁定：

一、以 2021 年 4 月 1 日为开放赎回日强制开放“某 1 号基金”，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0.7705 元赎回申请执行人孔某持有的 200 万份基金份额；二、变价“某 1 号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保证基金持有货币资金达到 1,541,000.00 元。

2022 年 8 月 4 日，上海金融法院按照赎回资金的差额与当前股票总市值之比计算需要变价的每只股票的数量，并向股票交易券商某证券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其以市价委托方式依次卖出（即抛售），使基金持有的货币资金达到 1,541,000.00 元，并将前述资金支付至“某 1 号基金”托管资金专门账户。某证券公司据此售出基金持有的各类股票，并由基金托管人将赎回资金 1,541,000.00 元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孔某。

三、裁判意义

1.明确私募基金开放赎回类仲裁案件的审查受理标准。私募基金开放

赎回类仲裁案件中，部分仲裁裁决中关于基金开放日、赎回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未予直接写明，人民法院在审查过程中，结合基金的实际运行情况和基金合同的具体约定判断仲裁裁决确定的基金管理人开放赎回义务的履行标准、对象、范围是否能够明确。前述内容能够予以明确的，应当认定仲裁裁决具有可执行性。

2.合理确定基金赎回强制执行方式。当基金内货币资金无法满足赎回要求，且基金内其他财产具有可分性、高度流通性、具备强制变现可能的情况下，可处置基金内其他财产获取货币资金用以赎回。处置基金财产时，注重保持基金持有财产的原有组成结构，按照比例处置基金财产，减少对基金后续正常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护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在开放赎回日的确定上，本案结合基金实际情况和金融市场交易规则，以生效仲裁裁决确定的基金管理人自动履行期限内的最后一个证券市场交易日作为开放日，并确定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赎回义务履行的主体上，鉴于私募基金合同对开放赎回义务的履行标准进行有明确约定，代基金管理人履行开放

赎回义务具有可行性，故可采取代履行的方式执行。

4. 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退伙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上海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股权投资基金，原告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系该合伙企业中占比 62.5%的有限合伙人，被告合伙企业另有普通合伙人一名，有限合伙人两名。《合伙协议》中约定，“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原告起诉主张，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在管理基金中的部分行为，严重损害基金及原告的合法权益，且被告合伙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存在多项违反基金管理人约定职责的情形，已实际造成合伙企业重大损失，故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在其向其他合伙人履行通知义务后，应认定原告实际已完成退伙，并应对合伙企业财产进行结算分配、办理登记变更手续。原告遂起诉请求确认退出合伙企业、退还合伙份

额权益并配合完成相关手续。经审理查明，原告在提出退伙前，并未对各投资项目提出否决意见。被告合伙企业在投资各项目时，存在一定程序瑕疵，但均不属于严重损害原告或合伙企业利益的重大违约行为。

二、裁判结果

上海金融法院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作出（2021）沪 74 民初 1556 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裁判意义

1.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一般不得任意退伙。一方面，任意退伙权作为一项对于合伙企业正常存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设定，应当在协议中予以明确清晰的约定。而从涉案协议内容的文义综合来看，无法得出合伙人享有任意退伙权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现有法律法规未明确赋予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约定的合伙期限未届满时享有任意退伙权。

2. 民事主体行使自身享有的民事权利时，亦应当遵循适当、必要及公平的原则。在本案合伙企业中，原告除了是投资者，同时也是合伙人之一，而且

是最大出资份额的持有人。原告除了享有获取投资收益的权利以外，也应当按照合伙协议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履行必要的合伙人义务。对于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存在的不当行为，除了退伙，原告还可以针对具体单个违约行为主张违约赔偿责任。因此，原告在违约情节不严重、未及根本违约的情况下主张退伙是不适当的。

3. 调处私募股权基金的退伙纠纷应当遵循稳定投资市场交易秩序的原则。私募股权基金的退伙纠纷须兼顾退伙合伙人权益与其他基金投资利益主体的价值权衡，案涉投资项目众多，事实纷繁，法律关系复杂。本案裁判以稳定市场秩序为导向，寻求经济、有效、适当的权利救济模式，引导投资主体增强法治意识、规则意识，营造市场健康发展的良性生态。

5. 戴某诉某科投资管理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某资管计划由某资管公司发行并作为管理人，某证券公司作为托管人。《资管合同》约定，投资期内，资管计划投资于有限合伙份额，有限合伙企

业主要投资于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股票、拟上市公司股权以及存款工具；有限合伙企业投资于单一企业累计不超过计划净值的 20% 等。募集完成后，某资管公司代表资管计划与某科投资管理公司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普通合伙人某科投资管理公司、有限合伙人某资管公司分别占出资 5%、95%。

资管计划存续期间，合伙企业投资四家“拟上市公司”各 3,000 万元，但无证据表明该四家公司具有上市计划或条件。某科投资管理公司另指示托管人将托管账户中的 1.8 亿元转至其自行开立的账户并将其中 6,030 万元擅自用于购买信托产品，导致合伙企业实际对目标公司的投资超过《合伙协议》比例限制。资管计划到期后，四家公司均未实现上市，信托产品亦未完成清算。后某科投资管理公司指定其关联公司受让上海某资管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实现退出。

本案原告戴某投资认购 300 万元资管计划份额，本金亏损 1,318,033.83 元，其以侵权为由，起诉请求上海某资管公司、某科投资管理公司、某证券公司赔偿投资本金损失、预期收益、利息损失及律师费。

二、裁判结果

上海金融法院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作出（2022）沪 74 民终 43 号民事判决：一、某资管公司、某科投资管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戴某某投资款本金损失 876,597.95 元；二、驳回某资管公司的其余上诉请求。

三、裁判意义

1.构建嵌套模式下投资者的救济路径。一般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投资者无权为自己的利益直接起诉次级管理人。本案参照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从可预见性、正当性和社会效果三个层面对嵌套资管合同中投资者对次级管理人的侵权索赔予以考量：其一，本案投资者及次级管理人对各自职责均有清晰的认识，最终的受害主体及损害金额均具有可预见性。其二，投资者享有的信托受益权受到《信托法》的保护，次级管理人负有勤勉尽责的义务，投资者对次级管理人侵权索赔具有正当性。其三，本案中投资者的利益与《合伙协议》下私募基金的利益存在一致性，投资者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终局责任人求偿，不会导致其承担额外的赔偿责任。

2.明确侵权诉讼作为债权救济手段的补充性要求。一般情况下，投资者

主张受益权应基于违约的请求权基础，但是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是违约救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不完整。管理人、次级管理人在两个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存在一定的区别，可能存在次级管理人造成的损失无法通过合同获得救济的情形；二是投资者对次级管理人没有其他适当的债权救济途径。管理人与次级管理人约定互不追究责任，投资者无法通过管理人追究次级管理人的违约责任；且由于资管计划已注销，投资者亦无法参照《公司法》第 151 条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行使归入权。因此，在投资者在遵循债权相对性的现有途径无法实现救济的情形下，直接起诉次级投资项目的管理人，符合侵权责任介入债权保护的补充性要求。

上海证监局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

1. 对某安系私募基金管理公司韦某等七人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一、基本案情

韦某、缪某杰通过某控股平台实际控制运营某安系私募机构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相关私募产品募集资金从托管户投向 SPV 后，汇入韦某控

制的“资金池”账户，由韦某统一调配使用。某安系私募机构共发行 45 只基金产品，共募集资金 122.35 亿元，私募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大部分为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不良资产，或者拍卖取得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最终仅 32.7 亿元用于购买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标的，有 39 只基金产品的募集资金真实投向与私募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均不一致，大量资金用于兑付产品本息、支付佣金等各项费用、对外投资以及其它非合同约定用途。韦某、缪某杰是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法行为特别严重；姜某、温某文、张某、单某芹、吉某全等人是某安系私募机构的主要管理人员，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行为严重。

二、处罚结果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市场禁入决定，认定某安系私募机构的上述行为构成挪用、侵占基金财产的违规行为，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四项“侵占、挪用基金财产”之规定。并依据《私募办法》第三十九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七项、第五条第三项、第七项，中国证监会决定：

对韦某、缪某杰分别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对姜某、温某文、张某、单某芹、吉某全分别采取 5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本案已依法移交司法机关,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某安系私募基金管理人集资诈骗罪,判处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三、监管警示

1.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等严重侵害私募基金投资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监管部门严惩不贷。该案在投资管理环节存在的“资金池运作”、挪用私募基金财产、未按约定用途投资、投资项目虚假等违规情形,是典型的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的行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谨慎勤勉义务,违背了与投资者的约定,极大危及投资资金安全。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出台的背景下,监管机构将强化私募业务监测监控,及时发现防范处置风险,持续关注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的恶性行为,严惩严重侵害私募基金投资者权益的行为。

2.严惩伪私募首恶,释放零容忍信号。某安系私募机构采取集团化运营,组织架构复杂,人员分工明确,实控人韦某通过控制的 169 家关联公司和其他关联人的银行账户用于资金调拨划

转,某安系私募机构运作的独立性完全丧失,成为了披着私募外壳的资金池,成为了非法吸收社会资金的渠道,韦某等私募机构“首恶”受到了市场禁入的惩戒,有力释放了“零容忍”的信号,再次告诫行业主体应增强合规意识,诚信守法经营,切勿触碰监管红线。

3.加强协作,对私募基金违法行为合力惩处。该案为大型涉众私募案件,涉及地域广、涉案金额大、维稳压力大,行政调查与刑事司法部门统一部署、紧密协作,充分发挥行政监管的专业优势和刑事手段的有力震慑,采取了有效的风险防控和协同办案措施,实现了调查现场可控、调查方向统一和调查取证协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协同办案和风险处置机制,目前法院已作出刑事判决,取得了良好的行刑联动效果。

2. 对某村资产管理公司违反私募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一、基本案情

甲私募股权投资系列基金(以下简称甲系列基金)由某村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某村公司)于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4 月发起设立。甲系列基

金在基金合同中约定，基金季度报告应披露“主要财务指标以及投资组合情况等信息”，基金年度报告应披露“本私募基金投资运作情况和运用杠杆情况”“本私募基金的财务情况”和“管理人取得的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等内容。

一是某村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与基金投资相关的重大信息。甲系列基金采用多层嵌套投资结构，其下层基金的资金以内保外贷方式出境，最终投资于境外某公司股权，内保外贷产生的费用包括境外贷款利息和手续费等，自2017年4月起每季度发生。该情况是与基金投资相关的可能影响甲系列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信息。某村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在甲系列基金2017年二季度至2018年三季度所有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情况。

二是某村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基金承担的费用。甲系列基金成立后一次性计提了三年的管理费、两年的外包服务费、托管费，某村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在甲系列基金2016年四季度报告至2018年四季度所有定期报告中披露具体情况。

冯某时任某村私募基金管理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实际履行总经理职

责，是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责任人，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二、处罚结果

2022年12月14日，上海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某村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构成《私募办法》第三十八条所述违规行为。对某村私募基金管理人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对冯某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

三、监管警示

1.压实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披露义务，保障投资者知情权。本案中，上海证监局加大查处力度，层层查实基金投资结构和信披事项，严格论证上层基金管理人信披义务的法律适用，在此基础上对违法违规者作出行政处罚，提醒私募机构和从业人员切实履行法定信披义务，不得以基金投资结构复杂或者非主动管理产品等为由规避信披义务。

2.嵌套投资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对底层投资情况负有注意义务。《私募办法》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是强制性要求。下层基金有

关事项影响上层基金投资、基金费用等，对上层基金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上层投资者对此类重大事项享有知情权，上层基金管理人应谨慎勤勉地了解下层基金相关情况，并向投资者及时披露对其合法权益造成实质影响的事项。本案中，下层基金资金以内保外贷方式出境，导致上层基金投资者承担的费用大幅上升，属于对投资者合法权益造成影响的重大事项。

3.私募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披露基金费用。基金财产的投资、回款、支出等运用情况及安全情况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事项，也是通常《基金合同》约定的必须披露的事项，基金管理人必须根据约定的要求和方式如实披露基金财产的运用情况，包括基金财产所承担的具体费用。基金管理人应当在计提费用当期定期报告及以后的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基金设立以来的计提费用，包括具体金额等明细情况。

3. 对某投资公司违反私募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月18日，某投资公司管理的某私募基金产品向某公司卖出一笔看跌期权，其标的股票为“XKP”，名义本金304,024,320元，期权费率2.39%，期初价22.80元，执行价22.80元，到期日2017年2月26日。某私募基金产品卖出上述看跌期权收取了期权费726.62万元，明显低于该笔期权期权费的市场公允定价，导致应归入基金财产的该笔看跌期权的期权费收入明显减少，损害了某私募基金产品的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时任某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某私募基金产品的投资经理杨某彬是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二、处理结果

2022年12月23日，上海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某投资公司的行为构成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投资活动，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六项的规定，构成《私募办法》第三十八条所述的违规行为。依据《私募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海证监局决定：对某投资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三万

元罚款；对杨某彬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罚款。

三、监管警示

1.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要依法履行忠实义务。私募基金管理人受托管理基金财产，应当履行忠实义务，其从业人员在执行职务或者办理业务过程中，个人不得利用所处地位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得从事可能产生上述损害的活动。私募基金开展衍生品交易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合理的估值方法和科学的估值程序，公允反映场外期权价值，及时、准确和完整地反映私募产品财产的状况，保护私募基金产品的财产和投资者利益。

2.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以复杂交易侵害基金持有人利益。案涉私募基金产品以复杂的场外期权组合方式买入“XKP”股票，涉多笔场外期权交易，场外期权合约要素内容复杂。上海证监局深入调查，逐笔分析场外期权交易，咨询行业专家，模拟测算，最终认定其中一笔场外期权交易收取的期权费明显低于市场公允定价，导致应归入基金财产的该笔看跌期权的期权费收入明显减少，损害了某私募基金产品的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

3.充分发挥反向移送机制优势，织密对私募违法行为的追责法网。本案违法线索来源于上海公安机关。上海公安机关在侦办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案中，因主体身份不适格未能追究当事人杨某彬的刑事责任，但发现杨某彬涉嫌违反相关行政规定的线索，移交上海证监局处理。上海证监局对相关违规线索进行了充分核查，并进行了立案调查。本案充分体现了行刑衔接机制在法律追责方面的优势，向市场传递了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信号，警示市场主体参与者不能心存侥幸，依法依规参与市场活动。

4. 对某坤资产管理公司违反私募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一、基本案情

某坤资产管理公司在私募基金募集销售和投资运作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一是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公司将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评定为 R3，但实际上产品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流动性较差，风险等级应高于 R3。上述基金被推介、销售的部分投资者为

C3 稳健型投资者，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与基金的实际风险等级不匹配。

二是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合计 22 个产品基金合同对信息披露方式进行明确约定，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公司 4 个产品基金合同中约定，基金管理人应当向投资者披露关联交易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信息。上述产品所投资的项目涉及多起公司与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公司制作的多份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未向投资者披露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林某自 2016 年 1 月起担任公司总经理，2018 年 10 月起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公司上述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二、处理结果

2022 年 12 月 28 日，上海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某坤资产管理公司上述两项行为分别违反《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据《私募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海证监局对某坤资产管理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45,000

元罚款，对林某给予警告并处 45,000 元罚款。

三、监管警示

1.管理人应谨慎勤勉，切实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确保将适当的产品卖给适格投资者。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有助于帮助投资者识别风险，减少超出其承受能力风险的损害，本案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压实私募机构切实履行各项适当性管理义务的责任，有力保护在产品信息获取、产品风险认知等方面处于弱势的投资者。

2.管理人应诚实守信，按照约定充分披露信息，规范关联交易。近年来资管领域的一系列风险事件中，管理人严重背离信义义务，通过实施不当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等不法手段谋取个人非法利益，严重影响行业信誉和投资者信心。本案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未按合同约定向投资者披露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警示管理人及时、全面地披露影响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信息，

完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等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增强基金管理运作的透明度。

3.投资者应树立风险意识，谨慎、理性投资，维护自身权益。私募行业作为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领域，管理人良莠不齐。本案违规事实发生于募集阶段和投资运营阶段，与投资者均存在紧密关联。投资者应牢固树立风险意识，谨慎投资、理性投资，积极了解私募基金的基本法规，通过查询中基协网站等方式，充分了解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基本信息，并在充分了解私募产品风险的基础上，审慎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5. 对某润基金等多家私募基金管理人违反私募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一、基本案情

某润基金、某时基金等两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胡某某、黄某某。某润基金所管理的 X 私募基金产品认购某时基金所管理的 Y 私募基金产品份额，Y 私募基金产品通过胡某某、黄某某控制的甲合伙企业间接投资乙公司。投资过程中，甲合伙企业形成对乙公司的大额债权。同时，某时基金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丙合伙企

业、丁合伙企业分别欠付所投资的戊公司、己公司债务。2018 年 7 月，甲合伙企业以其对乙公司的债权抵销了丙合伙企业、丁合伙企业对戊公司、己公司所欠债务，抵销金额高达约 1.254 亿元，占 X 私募基金产品募集资金的 41.82%。此外，某润基金、某时基金以及胡某某、黄某某控制的其他私募基金管理人还分别存在未按规定披露定期报告、未按要求报送年度财务报告、未妥善保存基金合同、投资者适当性材料相关资料等违法行为。胡某某、黄某某为上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且自 2019 年起，二人一起实际承担了相关存续产品的日常管理工作，为上述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

二、处理结果

2023 年 6 月 25 日，上海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相关行为损害了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违规行为，违反《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四条和第二十三条第六项的规定；未妥善保存私募基金业务相关资料的违规行为，违反《私募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未向投资者披露相关债权债务抵销事项以及未披露相关私募基金产品定期报告的违规行为，违反了《私募办

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未按要求报送年度财务报告的违规行为，违反了《私募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私募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海证监局对 8 家公司分别出具处罚决定书，合计罚款 32 万元；胡某某和黄某某作为责任人员分别罚款 32 万元。

三、监管警示

1.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坚持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某润基金、某时基金未恪尽职守、未履行谨慎勤勉的义务，相关抵销事项直接大幅减损甲合伙企业的财产价值，进而损害了 X 私募基金产品、Y 私募基金产品的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应切实履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职责，不得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

2.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加强全过程规范履责。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增强合规意识，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办法》等规定全过程规范履行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募集、依约投资、信息披露、材料保存、信息报送等法定义务，坚持合规风控全覆盖，强化对高管及核心从业人员的管理，厚植“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行业文化。

3.以行政处罚手段提升风险化解、处置的综合效果。这是上海证监局首次对涉系私募基金违法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相关某荣系基金曾管理规模超百亿，2018 年起资金链断裂，发生严重舆情及信访投诉风险。推进涉众、涉系风险案件的行政处罚工作，进一步妥善化解私募基金风险。

三、实务研究

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 和裁判要点 | 类案裁判方法

——摘自微信《上海一中法院》

公司决议是形成公司意思、实现公司自治的主要形式，是公司自治的起点。公司决议效力的认定涉及到公司内部自治、股东权利保护和外部债权人保护三重价值目标的实现，在公司法规则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但现实中却存在着法律规范供给不足、适法裁判标准不统一的实践痛点，有必要进一步明晰。现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进行梳理、提炼和总结。

目录

01 典型案例

02 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的审理难点

03 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0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01 典型案例

案例一：涉及公司决议程序瑕疵程度的认定

朱某、陈某为 A 公司股东，其中陈某占股 90%。A 公司以邮件方式向朱某户籍地寄送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的通知，但该邮件被退回。会议当天仅股东陈某到会，并做出更换公司董事的决定。此后，朱某以陈某明知其实际住址却仍对无人居住的户籍地址送达会议通知，股东会实际未召开为由，主张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案例二：涉及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认定

张某、李某共同出资设立 B 公司，其中李某以某专利技术出资，持股比例为 66%。此后，B 公司召开股东会，对“B 公司名下某专利的使用、转让等需经股东会过半数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的议题进行审议。会议上张某当场提出异议，但 B 公司仍以表决权过半数形成该股东会决议。张某主张 B 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专利成果的转让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才能通过，该决议实质上属于修

改公司章程范畴,但未经 2/3 以上表决权通过,遂起诉请求撤销该决议。

案例三：涉及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认定

C 公司由王某、赵某等六名股东设立,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其中王某出资 100 万元。此后,C 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向王某返还投资款 50 万元。赵某对该决议予以反对,但最终该决议仍经 2/3 以上表决权通过。赵某遂提起诉讼,主张王某将公司注册资本抽回的行为侵害公司财产权并损害了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请求确认该决议无效。

案例四：涉及公司决议外部效力的认定

D 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郑某向孙某借款,并以 D 公司的财产为借款提供担保,并向孙某提供了 D 公司为设立担保而作出的决议。借款期限届满后,因郑某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归还借款及本金,孙某即起诉至法院要求 D 公司承担担保责任。D 公司则称该股东会决议存在程序瑕疵,已经通过诉讼对该决议予以撤销,因此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行

为缺乏相应基础,担保对 D 公司不产生效力。

02 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的审理难点

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情形纷繁复杂,然而法律规范却未能对此提供充分的规则供给,导致实践中对公司决议的程序和实体瑕疵认定存在审查难点。

（一）公司决议程序的瑕疵程度认定难

公司决议程序瑕疵可导致决议不成立或可撤销两种情形,两者之间的区分就在于程序瑕疵的程度不同,决议可撤销的瑕疵严重程度弱于决议不成立。然而,实践中公司决议形成的程序环节繁多、瑕疵情形多样,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5 条,虽然对此予以列举式规定,但却未能涵摄广泛的争议情形,对程序瑕疵严重程度的区分与认定亦缺乏明确的标准,审判实践中类案异判情形时有发生。

（二）公司决议是否违反章程规定认定难

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的宪章，对公司组织架构、经营运转、内部权力分配等重大事项均做出明确规定，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然而，一方面实践中公司章程往往存在对相关事项未作规定、规定不明或者章程规定同股东协议约定相互矛盾的情形，需对章程内容予以解释；另一方面公司决议内容多种多样，存在超出、规避或实质修改章程规定等多种情形，亦需对决议性质予以识别，从而导致对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认定存在困难。

（三）公司决议无效情形的识别与认定难

公司决议无效制度是决议瑕疵处理规则中法律后果最为严苛的一项，在平衡公司法律行为意思自治与维护商事主体交易安全两种价值之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公司决议无效针对的是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严重瑕疵，然而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了决议无效的法律后果，却对引起决议无效的具体事由和构成要件未作明确规定，从而给实践中决议

内容违法的认定带来过于宽泛的解释空间和过于模糊的认定标准。

（四）公司决议对外效力的处理与认定难

我国《民法典》《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决议效力确立了内外有别的基本处理原则，公司依据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因此决议的外部效力规则高度依赖于相对人“善意”的识别。然而，善意本质上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描述，具有抽象性、模糊性等特征，实践中需依靠外观特征予以判断。而由于对外观特征的评判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导致公司决议的对外效力认定存在一定困难。

03 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对于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的审理，应当遵循尊重公司意思自治、注重公司组织特性、引导公司规范治理的基本原则，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对决议是否经由正当程序和民主决策、内容是否符合章程和

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从而最终确定公司决议的效力。

（一）诉讼主体的审查与认定

1.原告诉讼主体范围的确定

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中应以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则可依法列为第三人。较为复杂的是原告主体范围的确定。依据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类型的不同，原告的诉讼主体范围亦存在区别：决议不成立、无效之诉案件均是对决议合法性的根本否定，因此两者原告的主体范围相同，包括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其他与决议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案件中，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且此时股东作为原告不受是否有表决权、是否出席会议或参与表决以及持股数量的限制。

2.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

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中关于诉讼主体的资格，需要区分不同的类型予以认定。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中，原告仅限于公司股东，其在起诉时应当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对

于原告起诉时诉讼资格的确定应区分三种情况处理：

（1）起诉时已不具有股东资格的，因其对解决公司内部治理的该公司决议应认定为无诉的利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2）股东资格被公司决议剥夺的，则该股东仍有权作为适格原告对该剥夺其股东资格或职务的决议的效力提起诉讼；

（3）股东资格系公司决议后取得的，由于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功能在于矫正因决议存在瑕疵而损及公司整体利益，并进而影响到股东的个人利益，因此其在起诉时具有相应资格即应视为具有现时利益，可作为适格的诉讼主体。

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件中，《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不要求原告必须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或董事、监事职务，结合《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即可作为适格的原告。至于是否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则应以是否存在原告享有或管理下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为

判断标准，根据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予以判断。

3.主体资格争议的裁判

对于股东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应当由原告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提供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明文件予以证明，且并不以其已经实际缴纳出资或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至于隐名股东提起诉讼的，依据“内外有别”的原则，隐名股东对于公司而言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因此其亦不享有诉讼主体资格。

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是公司决议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对股东等资格身份存在争议时，若当事人已经就此另案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或其他诉讼，则应待另案处理结果确定后再对案件进行审理；若当事人并未另案起诉确认相应资格，仅是在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中以股东等资格身份提起抗辩，则人民法院可在案件中一并审查并作出认定。对于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 公司决议程序瑕疵的认定及其法律后果

公司作为组织体的特性决定其需经由正当程序与民主决策，方能形成有效的公司决议，因此是否履行合法召集、议事和表决程序即构成了公司决议有效性的程序审查要件，若决议程序存在瑕疵，则该决议即可能被认定为不成立或可撤销。

1.公司决议程序瑕疵的认定

公司决议的有效形成需要履行相应的程序要件，具体而言包括召集阶段、召开阶段、表决阶段三项，每一阶段均有不同的瑕疵情形。

(1) 会议召集阶段

召集阶段是公司会议的第一步。根据《公司法》第 101 条规定，合法有效的召集程序要求会议由合法召集人作出召集决定并通知每个成员与会。召集程序的瑕疵包括两类：

一是无召集权人召集。公司股东会议的召集权归属于董事会、监

事会、个别股东等特定主体，董事会的召集权亦归属于董事长、副董事长等特定主体，且召集权主体之间存在先后顺位，仅有在前顺位的召集权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召集职责时，后顺位召集权人才有权进行召集。因此，任何在该召集权范围外的主体召集，或者违反该召集权顺位的主体召集公司会议，均构成无召集权人召集的程序瑕疵。

二是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通知是会议成员知悉会议召开、参与决议并行使表决权的前提，合法有效的通知包括**通知方式、通知期间、通知内容与通知对象**四个要素。

通知方式上，应采取成员可以收悉的有效方式送达，除非成员下落不明或穷尽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或通知无记名股东，否则不得以公告方式通知；**通知期间上**，公司应依照法定或章程规定的期限提前通知；**通知内容上**，通知应包含会议时间、地点、待决事项；**通知对象上**，会议召集应通知到全体与会成员。

实践中，违反以上四要素所产生的程序瑕疵包含以下三类：

通知方式上未对与会成员进行有效送达、未通知会议的时间或地点、未对全体成员进行通知，均将剥夺成员参与决策和行使表决权的权利，此时均应视为未送达召集通知；未依法定或章程规定的期限提前通知，则构成未在规定期限通知；通知内容上未通知、通知有遗漏或通知内容与实际决议不相符的，均构成通知未载明待决事项的瑕疵。

（2）会议召开阶段

会议召开是依法召集的逻辑结果，但唯有依法召开且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会议方能形成合法有效的决议。实践中，公司会议召开瑕疵包括四种情形：

一是会议未实际召开。公司会议实际召开是形成决议的基本要件，亦是决议正当程序的基本准则之一。公司会议是否实际召开需要法官结合是否履行过通知义务、是否能够提供会议决议原件、决议是否经与会人员签名盖章、签名盖章是否为伪造等因素来予以综合认定。

二是未达出席定足数。公司会议的参会人员数或其代表的表决权数应不得低于法定或章程规定的最

低比例，否则将实质上违反多数决原则，不具有作出决议的合法性。

三是主持人瑕疵。公司会议依顺位可由董事长、副董事长、被推举董事等担任主持人，若为该特定范围之外的主体或违反该主持顺位的主体主持会议，则构成主持人瑕疵。

四是无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属于公司会议的必备文件，具有证明出席定足数、记载表决事项及表决结果、提供查询备忘的作用。会议记录虽然本身并非会议有效的要件，但会议记录作为证明要件可以佐证其他程序瑕疵的存在，从而对公司决议效力产生影响。

（3）会议表决阶段

表决是形成公司意思的基本方式，表决方式违法当然产生决议效力的瑕疵。表决方式瑕疵包括四类：

一是无表决权人表决。参与表决者需具有相应的表决权，此为表决行为的应有之义。实践中，无表决权情形通常包括不具有股东或董事等身份且无其他表决授权、所持表决权在特定情形不能参与表决两种情形。

二是议案未经表决。决议是公司意思形成的必经程序，审议事项需经过出席人员的议事讨论后作出或赞同或反对或弃权的意思表示，根据意思表示的计数结果，再依据多数决比例方能判断能否形成公司意思。

三是未达多数决比例。多数决是决议存在的意思合意要件，公司审议事项由与会人员决议后通过“人数多数决”或“资本多数决”方式才能形成公司意思，通过决议需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

四是非真实意思表示。公司会议参会人员所做表决非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亦将构成公司决议效力瑕疵，但此种情形与一般民法意义上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不相同，主要情形有两种：

表决权代理瑕疵，《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在受托人出现无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代理权终止情形下，即会发生表决权代理瑕疵；**伪造签名**，是指会议成员之外的人员为使召集、表决程序合法，而在召集通知、会议记录、决议书等文件上伪造签名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掩盖决议程序中存在的瑕疵。



2. 公司决议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

依据程序瑕疵严重程度的不同，不同的程序瑕疵情形亦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

(1) 公司决议不成立与可撤销情形的认定

在会议召集阶段：一是**无召集权人召集的情形**，非法召集的股东会议、董事会议不具有合法公司意思机关的地位，客观上仅能视为群体的集会，并不具备作出决议的能力和资格，其所作决议亦不应视为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故所作决议不成立。

二是**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的情形**，公司决议的效力亦因程序瑕疵的不同而予以区分：**未送达召集通知**，召集程序是公司会议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前提基础，无召集则无合法集会和表决，故亦不存在决议。对于**全体或部分公司会议成员未送达召集通知**，将从根本上剥夺成员参与公司决议和行使表决权的可能，使会议丧失合法的决议主体资格，故其所作决议不成立。

通知期间规定的目的在于让成员有充分的时间了解会议情况和决议事项，以决定是否参会和作出何种意思表示，而通知需载明待决事项系为了使会议成员事先了解待决议事项，作出更为理性的决定，两者虽影响会议成员意思的形成，但不影响会议成员在会议上作出意思表示，亦不影响公司意思的成立，故未

在规定期间通知、通知未载明待决事项的瑕疵仅导致决议可撤销，而不影响决议的成立。

在会议召开阶段：一是会议未实际召开的情形，召开会议是形成决议的前提条件，公司未实际召开会议的自然无法形成决议，亦不存在所谓决议，故此时将导致决议不成立。

二是未达出席定足数的情形，未达定足数本质上是与会成员所代表的表决权未达合法要求，同未实际召开会议并无本质区别。因此股东会、董事会的召开不具有公司意思机关的合法性，相应亦无法表决，所作表决应自始不成立。

三是主持人瑕疵的情形，《公司法》设置会议主持人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会议效率、保证召开过程公正，因此单纯的主持人瑕疵情形并不构成严重的程序瑕疵，属于可撤销情形。但实践中主持人瑕疵通常仅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往往是与会议未召开、无召集权人召集等严重程序瑕疵伴随产生，此时则需要依据其他情形予以综合认定。

四是无会议记录的情形，会议记录仅是一种证明文件，其本身并非会议有效的要件，因此单纯无会议记录的瑕疵并不影响决议效力。

在会议表决阶段：一是无表决权人表决的情形，无表决权人的投票不应当被计入表决权数中，若将无表决权人的表决权数予以扣除后不影响决议通过，则该决议成立，若该表决权数扣除后决议未达多数决比例或出席定足数，则该决议不成立。

二是议案未经表决的情形，无表决则无决议，更加不能形成公司意思，此时伪造的公司决议自然应属不成立。

三是未达多数决比例的情形，决议的意思表示没有形成，未能形成团体意思，此时决议不成立。

四是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对于表决权代理瑕疵的，需审查代理行为是否具有权利外观、能否构成表见代理或有权代理，若构成则该代理人的表决行为即应视为会议成员的行为，不会对公司决议效力产生影响，若不构成则此时应适用无表决权人表决情形时的规则来认

定决议是否成立；对于伪造签名的，伪造签名实际上是其他程序瑕疵的结果，对公司决议效力的影响需结合是否存在其他瑕疵情形来予以判断。

如案例一中，A 公司明知朱某的住处地址却依然向其户籍所在地邮寄股东会议召开的通知，实际上构成了未送达召集通知的程序瑕疵，此种瑕疵从根本上剥夺了朱某获知和参加公司会议、行使表决权的可能。因此，尽管朱某仅持股 10%，即便参加会议亦无法对表决结果产生影响，但因召集程序存在严重瑕疵，导致所作公司决议不成立。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4 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会决议虽存在可撤销情形，但该瑕疵程度显著轻微且不会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的，法院应裁量驳回对该决议的撤销诉请。实践中可撤销决议的裁量驳回情形应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可裁量驳回仅针对会议召集程序或表决方式方面的程序性瑕疵，对于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所致的可撤销情形并不存在适用裁量驳回的空间；

第二，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方面的瑕疵仅为轻微瑕疵，实践中应以程序瑕疵是否会导致股东无法公平地参与多数决意思的形成以及获取对此所需的信息为判断标准；

第三，程序瑕疵并未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亦即该程序瑕疵的存在并不会改变公司决议的原定结果，不具有影响决议效果的可能性。

3.公司决议程序瑕疵的修复

存在程序瑕疵的公司决议，当事人有权主张决议撤销或不成立，但该程序瑕疵亦可通过会议成员事后追认、执行决议内容等多种方式予以修复。程序瑕疵是否被修复，应

(2) 可撤销决议的裁量驳回情形认定



结合当事人对决议是否知情、是否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是否实际履行过决议内容、决议形成时间及权利人是否主张过异议等多种因素予以综合认定。实践中可包含以下几种情形：

❖《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议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虽存在程序瑕疵，但公司会议成员通过事后在决议上签字的方式对决议予以追认；

❖虽未召开公司会议，但会议成员以另行提供书面确认的形式对决议内容予以认可；

❖会议成员对决议内容知情且未提出过异议，或其曾对决议内容予以履行。

（三）公司决议实体瑕疵的认定及其法律后果

公司决议是多数决机制下的公司意思形成机制，是公司内部自治的产物。公司决议合法有效不仅需遵守正当程序和民主决策，内容还应当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否则即存在实体瑕疵，对

决议效力产生影响。公司决议的实体瑕疵包含两种情形：

1.公司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认定

根据《公司法》第 22 条规定，公司决议内容违反章程规定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对于公司决议是否构成对公司章程的违反，应当从三个方面予以审查：

第一，公司决议性质的识别

公司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是指公司内部某一项运作或经营事项的决策违反了公司章程对该表决事项或会议程序、表决方式的现有规定，此时仅需以该章程条款是否适用于该决议为依据予以审查。

若决议内容另行增加新的特定事项或会议程序、表决方式，超出了章程规定的内容，则该决议实质上属于对公司章程的修改，应依据《公司法》第 43 条关于章程修订的特殊多数决规则来认定该决议内容的效力。

第二，公司章程内容的解释

决议内容是否违反章程规定，在公司章程规定明确的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循该规定的文义来予以认定，无需对章程规定进行解释，避免司法对公司内部治理的过分干预。仅在章程规定不明时，才需从章程体系、目的、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解释，且应以维护公司正常经营、保护股东权益为原则进行合理解释。

第三，股东协议的例外情形

公司全体股东就公司管理或权利分配等事项所达成的一致协议，对全体股东均具有约束力，性质上同公司章程效力一致。全体股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达成一致协议，若该协议内容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符，则实质上构成对公司章程的修改。因此，公司决议虽然违背公司章程，但若该决议内容符合全体股东一致协议约定的，则仍为内容合法。

如案例二中，B 公司决议内容上同时兼具实体要素与程序要素，并非是通过简单通过一项公司内部经营事项，实质是对特定事项增加新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构成对章程的修改。因此，该股东会决议实际上违反了 B 公司章程中关于章程修改的特殊表决权比例的规定。

2. 公司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认定

公司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实践中，公司决议违法无效包括侵害公司利益、侵害公司股东利益、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四类无效情形。

侵害公司利益无效情形：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享有其合法权益，对该些权益的保护即体现为公司财产独立、资本维持、内部组织架构等规范上。因此，在存在决议内容侵害公司法人独立财产权、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组织机构职权划分等损害公司利益情形的，均将导致决议无效。

侵害公司股东利益无效情形：依据《公司法》第 4 条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具体而言包括股东的知情权、参与表决与决策权、利润分配请求权、选择及监督管理者权、出资期限利益、优先购买股权和认购新股等权利，以决议形式侵害股东合法权益的将导致决议无效。

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无效情形：公司决议虽是公司内部意思形成机

制，但其内容涉及公司事务和运转，亦会间接对公司外部债权人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即便决议程序合法，在存在决议违法分配利润、进行重大不当关联交易等导致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亦将导致决议无效。

其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情形：除以上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导致决议无效的情形外，公司决议作为一种法律行为，亦应遵守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在公司决议存在通谋虚伪表示、恶意串通、违背公序良俗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时，亦将导致决议无效。

如案例三中，C 公司虽然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向王某返还出资 50 万元的决议，但此项决议内容允许股东未经法定程序即可取回其出资，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的基本原则，损害了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故该决议仍因内容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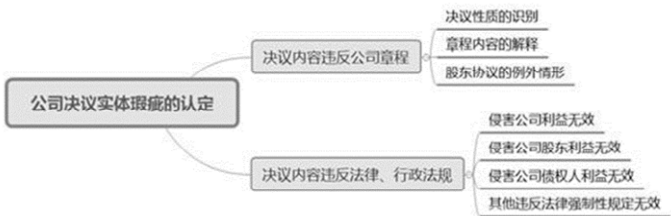
（四）公司决议的外部效力审查与认定

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决策机构按照其权限分工对公司经营管理事项等做出的决定，通常而言其决议事项仅局限于公司内部事务，对外并不发生法律效力。然而，公司决议中亦存在涉及公司与公司以外的他人交易的事项，此时则需讨论，在公司决议被认定无效或撤销时对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1.公司决议产生外部效力的情形

公司决议对外部是否能够产生拘束力，以其所形成的原因为依据，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公司决议内容涉及外部关系，且公司章程、决议或其他内部规范等规定需经过决议；**二是**公司决议内容涉及外部关系，且《公司法》就该决议事项作出强制性规范。

就**第一种情形**，通常是公司内部规范对决议事项的内部限制，而**第二种情形**则源于《公司法》规定，对公司决议作出强制性规范的，存在如下情形：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增资、减资，发行公司债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上市公司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股份公司发行新股的新股种类、数额及向原股东发行新股的种类、数额等；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当上述类型的决议事项涉及到外部关系时，公司决议将产生外部效力。

2.公司决议外部效力的作用方式

公司决议外部效力的作用方式在于，法院需要审查与之相关的外部相对人是否为善意。亦即，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外部相对人若为善意**，则公司依据该决议与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外部相对人若非善意**，则需进一步对相对人的恶意予以区分：若相对人明知决议存在瑕疵而继续与公司发生以决议为依据的法律行为，公司事后未追认的，则此时公司依据该决议实施的外部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若相对人系以追求损害公司利益为目的，则可依据恶意串通或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恶意背俗而认定外部行为无效。

3.公司决议中外部相对人善意的审查

公司外部相对人是否为善意，应依据行为外观能否排除推定恶意为标准进行认定。具体实践中，应当区分决议外部效力的两种情形来认定。

(1) 对依据公司章程或内部规范等需要对相关事项通过公司决议的情形，此时由于该种限制仅是基于公司自治所作的内部安排，故相对人做交易时不会去询问，也不了解、不知道法人的内部决议效力状态。因此，在公司外部相对人没有被事先明示通知决议瑕疵的情况下，即可推定相对人具有善意，该外部法律关系应属有效。

(2) 对依据法律规定需要对相关事项通过公司决议的情形，则以相对人是否积极履行过对公司决议的审查义务为标准，举证责任上应由外部相对人自证其为善意，否则即推定为恶意。

例如，公司外部相对人持有相应公司决议复制件、公司决议所需

股东在该外部行为所涉协议上签字或另行出具确认文件等。公司外部相对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需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并不需要外部相对人审核公司决议是否为适格或真实。

具体而言，公司外部相对人需进行形式审查的内容包括：审查股东或董事的身份是否属实、是否存在应回避主体参与决议的情形。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 18 条规定，公司其他主体主张存在公司以机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者变造、决议程序违法、签章（名）不实或存在其他决议不成立、可撤销、无效事由抗辩外部相对人非善意的，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变造的除外。

如案例四中，D 公司为他人借款提供担保，依据《公司法》第 16 条规定，该项担保需经由公司股东会

决议，故此时则需要审查孙某是否为善意相对人。本案中，孙某在接受担保时已经对 D 公司的决议进行审查，故其为善意相对人，担保关系并不因决议已被撤销而产生影响。

0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实践中，当事人可能会同时提出其他类型诉讼与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由于《公司法》第 22 条并没有规定必须通过公司决议效力之诉才能认定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效力，因此在诉讼主体相同时，在涉及公司决议效力的其他类型的诉讼案件中，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诉请就决议效力作出裁判。

如您对本资料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联系：徐倩倩 qianqian.xu@mhplawyer.com